

【图林·史志】

## 外交战略下的中国图书馆国际交流工作(1949—1969年)

●吴稼年 顾焯青 (江南大学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我国的外交战略在1950年代采取“一边倒”的战略,在1960年代采取“反两霸”的战略。在这一外交战略的指引下,1949—1966年上半年,我国图书馆界通过派出留学生、邀请苏联图书馆学专家指导工作、国外专家对我国图书馆的参观访问、国内专家出国参观访问和参加相关活动、大力开展出版物国际交流等工作,不断扩大国际交流,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外交战略 国际交流 图书馆文化交流 图书馆事业史

[中图分类号]G2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22)02-0058-08

[引用本文格式]吴稼年,顾焯青.外交战略下的中国图书馆国际交流工作(1949—1969年)[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2(2):58-65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站立起来的标志是什么?毛泽东给出了答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sup>[1]</sup>由此,确立了新中国初期外交战略中的基础之一:另起炉灶,其核心思想是与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彻底决裂,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真心愿意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任何国家,只要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采取与中国人民真诚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sup>[2]</sup>。但是,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企图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途径,封锁、扼杀还在摇篮中的新中国。在历史大潮革命性的变革中,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到底是倒向帝国主义、或倒向社会主义、或做骑墙派的历史选择中,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形势,积孙中山40年的经验和共产党28年的经验,“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sup>[3]1477</sup>,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正确、果断地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全面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我们在

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sup>[3]1480</sup>。

这种“一边倒”的战略,指的是对待国际战略的态势,不是要事事处处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不是作附属国,而完全是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独立为前提。对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采取“等一等”的态度,先是要做好“打扫干净屋子”的工作,再做是否“请客”进来的考虑,即在否定反动派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的基础上,否定反动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同时否定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并在国内清除所有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最后在此基础上,再视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态度重新考虑建交问题。

在“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指引下,苏联和我国最早建交,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双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同盟国家的侵略行为;双方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互助合作关系。该条约于同年4月11日正式生效<sup>[4]</sup>。由于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中苏两国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sup>[5]</sup>。

1949年10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苏建交

问题的报告,并正式任命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10日,苏联驻新中国大使抵达北京。20日,王稼祥离京赴苏<sup>[6]</sup>,中苏两国外交工作全面正式地开展起来,并产生了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次建立外交关系的高潮。至1950年10月,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就有18个。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外,还有诸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等国,另有英国、挪威和荷兰在与我国举行建交的谈判中<sup>[7]</sup>。

1960年起,苏联公开恶化与我国的关系,并于当年7月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和合同,单方面全部撤走在华的所有苏联专家,由此我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随之改变,实行反苏修、反美帝的“反两霸”战略。与此同时,我国加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支持西欧成为抗衡美苏两霸的第三支国际力量,积极开创与亚非拉国家的外交新局面,倡导反帝反修统一战线,推动世界革命,进而为以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产生奠定基础。

在建国初期外交战略的指引下,图书馆界大力开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广交朋友。通过派出图书馆学留学人员、我国招收外国图书馆学留学生、互派人员参观访问图书馆及互相交换、赠送出版物等开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在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以下将这段时间简称为“17年”)间取得很大成效。

### 1 留苏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必然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其中对外文化交流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1年的时间中,新中国就实现了中苏互换文化代表团、艺术团和合拍影片等合作,并与东欧各国和朝鲜、越南、蒙古等国互办或举办展览、电影周,文化代表团和专家进行互访,交换图书资料,派遣留学生等。20世纪50年代,“我国相继同12个社会主义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建国10年,我国同社会主义各国互换文化代表团组共1700多起,17400余人次”<sup>[8]</sup>。

为了更好地培养出我国具有国际眼光和水平的高级知识人才,从1950年起我国就开始外派留学生到社会主义国家学习。1950年,根据文化合作协定,我国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派遣了留学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外派留学生的规模不断加大。为规范留学生的管理工作,“为了督促和检查1950年度派去波、捷、罗、匈、保五国的交换留学生(以下

简称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能使按期完成学习任务”<sup>[9]</sup>。教育部于1950年12月2日发布《1950年度派往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交换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为以后该项工作的管理奠定了基础。

1951年起,我国开始较多地派出留学生,这一工作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1年5月18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指出,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任务之一,即是“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出国留学,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留学生回国”<sup>[10]</sup>。教育部在“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1951年7月6日)中明确了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要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和教学经验,从而开启了新中国政府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征程。1952年,教育部根据1951年的派遣经验,加强对派遣人员质量要求的把握工作,提出“宁缺毋滥”方针,因而派出人员的数量要少于1951年。1953年起,我国进入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的建设时期,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需求量剧增,“为培养我国高级工业技术人员及高等学校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大量选派留学生去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留学,就有极其重大的意义”<sup>[11]</sup>。为此,我国迅速增加留苏人员。根据教育部1953年的计划,“今年派遣赴苏留学生六百名左右,赴东欧兄弟国家留学生90名。计划至1957年止派遣赴苏留学生1万人,其中研究生500人,进大学者9500人”<sup>[12]</sup>。高等教育部、教育部、人事部关于1953年选拔留苏预备生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中,明确当年各地选送投考生共2795名,其中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研究生238名,大学一年级学生1767名,高中毕业生790名,“预计从中录取1700名(计留苏研究生180名,留苏大学生1520名)。另外从中录取77名赴东欧各兄弟国家学习”<sup>[13]</sup>。“指示”明确指出预备生先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1年俄文及补习政治课,经政治审查、俄文考试、身体检查均合格者,于1954年8月出国学习。

在1953年选拔留苏预备生的过程中,图书馆学专业首次有人入选,即赵世良教授。赵世良于1950年高中毕业后留在北京第四中学承担图书馆管理工作,195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北大刘国钧、王重民、陈鸿舜教授十分喜爱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赵世良”<sup>[14]</sup>。1953年,北京大学在校内招考留苏学生,赵世良以出色的学习成绩被选为我国图书馆学专业首批留苏预备生,同年秋入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习1年。1954年

秋入苏联国立莫斯科图书馆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派到苏联学习图书馆学的留学生。这一年,共有1375名人前往苏联学习,其中研究生149人,大学生1226人,主要是工科生,涉及矿冶、农业、财经、政法、文科、医科、师范、艺术、体育等专业。其中文科42人,图书馆学专业占其中1位。可见,在高级人才的培养中,图书馆学亦受到重视。

在“17年”中,图书馆界派遣到苏联留学的人员不多,共有7人,分别是赵世良、鲍振西、郑莉莉、赵琦、佟曾功、彭斐章和吕济民,他们都在同一所学校留学,即苏联国立莫斯科图书馆学院。其中吕济民学的是图书馆学中的“群众文化专业”,这与他在留学前曾担任过安徽省巢县烔炀文化馆馆长和县政府文化科长有关,亦可说是工作与专业对口。其余6人都是在图书馆学系学习图书馆专业课程。

从图书馆界7人在留学前的经历可分析出,最初图书馆界的留苏生是在大学一年级学生中选拔的,如新中国图书馆学留苏第一人赵世良即在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一年级时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后来即重点从有工作经历的及工作、政治表现好的人员中选拔。如1955年到苏联留学的鲍振西、赵琦、佟曾功,分别在北京图书馆、东北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的工作岗位上被选拔而出。但还保留着从大学一年级学生中的选拔工作,如郑莉莉,在选拔为留苏预备生之前,于1953年9月被保送到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1年后即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1955年9月赴苏留学。以后的赴苏留学生则主要从有工作实践的人员中选拔,如彭斐章于195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留校任教,讲授中文编目,1956年赴苏留学。吕济民于1957年赴苏留学。佟曾功、彭斐章、吕济民3人是副博士研究生,其他人为本科生。

他们是“留苏”的一代,是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留学工作的亲身经历者,亦是我国图书馆界第三代学人的核心代表群体中的组成人员。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体现出新中国开创早期留学工作中的兴起与曲折。这种曲折,也体现在一些本已考取为留苏预备生,但因当时外交、留学方针的变化而被取消留学资格。在图书馆界,潘天楨1956年4月被任命为苏州图书馆馆长,于当年7月参加文化部留苏研究生考试被录取,但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和我国派遣留学生的方针的变化,他并未成行<sup>[15]59</sup>。

## 2 苏联来华的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

1949年7月初,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苏联,与苏共中央进行了5次会谈。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建国后的建设问题,希望苏联派一些专家帮助我国进行建设。8月,结束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回国,同行的就有96名各行各业的苏联专家,这是第一批应我党和政府邀请前来我国的苏联专家<sup>[16]</sup>。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除去到期回国者不计,至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有221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有403人,包括苏联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

在图书档案领域,针对我国当时的急迫需求,苏联政府应我国政府的邀请,较早派出的是档案专家。建国初期,我国新建中国人民大学,并将其确定为我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两所示范性学校之一。1952年该校创办专修科档案班。“由于缺乏教员,周恩来总理亲自给苏联方面打电话,聘请档案专家来我国讲学”<sup>[17]</sup>。1952—1955年,苏联派遣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来我国,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讲授档案课程。应我国图书馆学专业的需要,1955—1957年,苏联派遣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来我国,帮助我国进行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建设。

与谢列兹聂夫以授课为主、讲演为辅不同,雷达娅在1955年下半年刚到北京时,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北京大学开展图书馆学系的教学改革,兼顾社会讲演和图书馆指导工作,在1956—1957年,则转为以讲演和指导各地图书馆工作为主。这在对雷达娅的称呼上也可反映出来,她的身份是“文化部苏联专家”,她的工作范围,包括社会文化机构如文化馆、文化宫、俱乐部等的城市文化工作。

雷达娅来自莫斯科图书馆学院,主要在该学院担任书史课程。她与刘国钧等人的第一次会晤是在1955年8月,雷达娅简单地介绍了莫斯科图书馆学院的情况,以及她来华的任务和如何讲课的计划。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北大图书馆学系,“或是做报告,或是领导讨论。从图书馆教育的任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至业务中的问题、教学方法各环节的应用,都有详细地、深入地、具体地讲解”<sup>[18]</sup>。在北大图书馆学系进行教学改革的阶段,当时系内人员对许多问题“摸不清头脑”,在雷达娅的帮助和指导下,北大图书馆学系拟定了3年制的教学计划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明确了课堂、教学、生产三结合的实习计划,以及课堂讨论、教学形式的任务、内容

和运用方法<sup>[18]</sup>。

1956年起, 雷达娅的主要任务转为在各地巡回讲演、视察指导图书馆工作。她对我国图书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划、业务改进和干部培养等方面给予了热情而无私的帮助, 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对我国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业务上的改进和提高帮助很大。“为了感谢雷达娅同志对我们的帮助, 并传播她所介绍的苏联图书馆的先进经验与业务上的一些重要建议”<sup>[19]</sup>,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专门编辑出版了《苏联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同志关于图书馆工作报告集》, 内容主要包括: 在全国性图书馆工作会议上、各种图书馆工作座谈会上、进修班讲习会上所作的报告与问题解答, 以及在视察时对当地图书馆工作人员所作的报告、向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所作的视察汇报等。这仅是雷达娅所做的一部分工作。在该报告集的出版过程中,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还正在编辑一部有关雷达娅对文化馆、俱乐部、群众艺术馆方面的工作报告集, 以便于文化馆干部学习参考。对于雷达娅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所介绍的教学方面的材料, 以及博物馆工作、出版工作方面的材料未编入在内。可见, 雷达娅对创建新中国的图书馆学教学体系和图书馆事业及文化事业建设等工作, 具有很大的帮助。

### 3 国外专家对我国图书馆的参观访问

在20世纪50~60年代, 国外专家对我国图书馆的参观、交流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 大致有两次高峰, 分别是1956年前后和1959年前后。

在1956年前后, 主要是以苏联专家为主体, 同时也邀请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专家, 组织开展了他们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参观访问和交流、讲演及评价等活动。就图书馆学及图书馆事业的交流、讲演, 主要是苏联图书馆的专家。这一时期以雷达娅为核心。雷达娅于1955年7月到达北京后, 除了帮助和指导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学改革的问题外, 同时还开展讲演, 大力宣传苏联图书馆工作, 并参观访问视察有关图书馆, 以了解和指导工作, 参加相关座谈会等。如1955年8月18日开展了“关于苏联图书馆网及其藏书情况的介绍”, 11月23日和29日、12月13日, 在北京图书馆举行的有关儿童图书馆工作的座谈会上, 她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儿童图书馆工作”问题。12月12日, 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关于北京市建立市区图书馆问题的座谈、讨论会中, 雷达娅介绍了苏联建立市区图书馆的简要情

况, 并针对我国的情况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推进了我国将文化馆阅览室改造成市区图书馆的工作。她在1957年7月回国前, 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和湖北、江苏、山东、甘肃、浙江、河南、陕西等省。1956年1月, 苏联图书馆学专家伊格娜多娃访问沈阳, 她为辽宁省图书馆作5次业务报告, 组织沈阳市各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讲, 每次有200多<sup>[20]</sup>。另外还邀请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图书馆专家作讲演。如1956年5月, 北京图书馆邀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馆长苏里安·凯恩来京, 并于当月25日在北京图书馆作“法国图书馆事业”报告<sup>[21]53</sup>。

这一时期, 这种学术上的交流并不很多, 外国专家的活动主要是对图书馆的参观访问。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是苏联有关教育专家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参观、评价比较多。他们主要是参观有关学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等, 以指导和评价当时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建设情况。从1949年到1957年底, 我国共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聘请苏联专家861名, 聘请高教方面的苏联专家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这3所学校仅在1954年就分别聘请苏联专家21名、30名和23名<sup>[22]</sup>。1954年, 高等教育部聘请了3位苏联顾问, 他们都参观了各所学校, 深入了解情况, 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当时的首席顾问列别捷夫曾于1954年参观了京津地区的10所高校, 于8月到山西参观3所学校, 于11月参观武汉、杭州、上海、南京等23所高校, 参观了解高校图书馆是其中重要的一环。1956年1月5日, “教育部苏联顾问费拉托夫专家在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李实培同下视察了(山西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和部分校舍”<sup>[23]205</sup>。1957年, “国家教育部林砺儒副部长和苏联专家来校视察时认为, 从师资和教学设备情况来看, 大连师范专科学校已具备改为师范学院的条件”<sup>[24]</sup>。

这一时期开始有各种不同国家、不同人士参观我国具有宗教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图书馆。1955年7月, 印度文化代表团在西安访问, 该访问团专门到陕西省图书馆拜谒馆藏藏经<sup>[25]</sup>。1956年6月, 苏共中央委员、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著名散文作家萨比特·莫卡诺夫到西北民族学院参观, 他在参观图书馆时见到了自己的著作十分高兴, 参观结束后他向该馆赠送了他的著作<sup>[26]115</sup>。是年, 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文幼章和夫人、美国和平人士约翰逊教长等, 都到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参观过。

1959年前后,参观我国图书馆的外国朋友呈现出广泛化的趋势。在这一来华人员访问图书馆的高峰中,关于学术交流方面,仍然主要是苏联访华学者与我国图书馆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如1958年12月,以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拉菲柯夫为团长的访华团,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负责具体接待。在访问过程中,除两国科学院图书馆开展了大量的交流活动外,还由代表团团长拉菲柯夫和团员阿列克塞也娃为北京地区图书馆人员作“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工作组织及其对科学研究人员的服务工作”和“苏联科学、社会科学基本图书馆的组织及其图书馆网”的学术报告,并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出版物编委会举行座谈<sup>[27]39</sup>。

这一时期,欧洲一些国家有关人士也相继参观访问我国有关图书馆。1957年6月,新西兰著名和平人士路易·艾黎参观西北民族学院,同时参观图书馆<sup>[26]116</sup>。是月,法国访华代表团参观甘肃省图书馆<sup>[28]162</sup>。1959年4月,瑞典皇家图书馆馆长魏勒斯夫妇应邀来华参观访问<sup>[21]58</sup>。10月,挪威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约尔根·福科特,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陪同下参观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sup>[26]117</sup>。是月,丹麦皇家图书馆馆长毕尔克隆德到长春图书馆参观<sup>[29]</sup>。此外,1958年越南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行参观苏州图书馆<sup>[15]63</sup>。1959年5月,越南中央图书馆代表团参观北京图书馆<sup>[21]58</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留学的非洲学生开始组成参观团,参观我国各地,包括参观图书馆。如1959年4月,“非洲学生代表团4人来校(山西大学)参观访问,代表团参观了图书馆、生物系、化学系、体育馆等”<sup>[23]207</sup>。接受非洲留学生,表明我国在外交战线上的一些变化。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在1959年2月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的谈话中指出:“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sup>[30]</sup>毛泽东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同我国相互支持的最主要力量,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20世纪60年代后与亚非拉加强外交关系成为我国外交工作中的重点之一。

在1960—1965年国外来访者主要以参观北京图书馆为主。有分别来自芬兰、伊拉克、瑞典、希腊、缅甸、朝鲜、印度尼西亚、越南、波兰、奥地利、巴基斯坦、保加利亚、日本、巴西、罗马尼亚、英国、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团体和个人<sup>[31]497-499</sup>。期间,苏联方面自

海参崴图书馆于1960年9月有从事目录工作的馆员参观访问北京图书馆以后,若干年中基本停止,直到1964年10月20日,“苏联群众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北图,这是赫鲁晓夫担任领导职务后,来访的第一个苏联文化界代表团”<sup>[31]499</sup>。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招收的外国留学生中,也包括图书馆专业的学生,“1963年11月6日,高校图书馆学系越南留学生来访,鲍振西同志接待了客人,并介绍了越南文书刊整理与利用情况”<sup>[31]498</sup>。

#### 4 国内专家出访

在文教方面,建国初期我国主要派遣教育领域的专家,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参观考察。1952年9月至1953年4月,我国派出访华教育考察团,先后对波、德(民主德国)、捷、匈、罗、保等东欧6国文化教育事业进行考察<sup>[32]</sup>。一些高校,如交通大学在1953年至1959年“还陆续派遣教师到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6所高等学校进行参观访问”<sup>[22]</sup>。

1956年,我国逐步派出图书馆界代表团或个人参观访问国外图书馆或参加相关活动。这些活动以北京图书馆为主体。是年,北京图书馆时任副馆长丁志刚赴英参加苏格兰国立图书馆新馆落成典礼。回国途中,顺访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sup>[21]54</sup>。这次参加的图书馆活动和参观访问活动,推进了我国图书馆界和欧洲一些国家图书馆的交流。

1957年,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左恭两次出国。5月,文化部派出以左恭为团长的我国图书馆代表团,赴苏联和民主德国考察图书馆事业,回国途中左恭顺访了芬兰<sup>[21]55</sup>。这次左恭外出考察参观访问时间达4个月,收获颇丰。是年,他还应瑞典皇家图书馆馆长魏勒斯的邀请,赴瑞典参加该馆新馆落成典礼。

1959年,北京图书馆采访部杨殿珣经文化部批准,赴民主德国参加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他从7月21日出发至10月30日回国<sup>[21]58</sup>,历时3月余,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61年9月,左恭赴瑞典参加瑞典皇家图书馆300周年庆典活动,庆典活动结束后进行了参观访问活动,这次活动,“在结识图书馆界人士,加强两国图书馆的交流方面获得较好的效果”<sup>[31]497</sup>。

1962年6月30日至7月6日,丁志刚副馆长赴苏联参加国立列宁图书馆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sup>[31]498</sup>。活动结束后就很快回国,反映出了当时我国同苏联关系的现实状况。

## 5 国际交换

出版物的国际交换工作,是贯彻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加强与世界各国沟通、交流、了解的重要渠道之一,它既是大力宣传我国对外方针政策的渠道,也是大力进行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是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我国藏书来源与系统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上多数国家对新中国不够了解,我国急需建立多渠道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此时,大力宣传我国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力争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成为对外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出版物的推送与交换,成为外交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为做好这一工作,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后就开始以外文出版社的名称出版外文版图书,并做好出版物的对外推送、交流工作。1952年7月1日,国际新闻局撤销后,正式成立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版书刊的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的业务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sup>[33]</sup>。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当时外文出版社把我国出版的一些外文书刊赠送给国外许多单位。“1954年起,该社把其中的121个单位移交给我馆(北图),由我馆交换组负责赠书事宜。1958年,这样的赠送户达355个,其中以亚、非、拉等国家图书馆居多”<sup>[34]</sup>。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从1949年8月10日华北高教委准以俄文书籍采访员张全新暂代我馆秘书长,中苏两国间便最早开始进行国际交换工作”<sup>[35]</sup>。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与国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展开,曾先后责成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对外开展书刊交换工作。根据要求,“北京图书馆可以用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物进行交换,其余几个单位原则上只交换他们自己出版的书刊”<sup>[36]418</sup>。实际上,在解放后我国开始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时,已确立了以北京图书馆为工作核心的地位。1949年,北京图书馆就与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等建立了交换关系。

新中国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是与苏联互相交换、交流起步的,而且以苏联为核心,以社会主义阵营为重点,兼及和扩大与其他国家的交换工作。北京图书馆在1949年至1952年间,共收到世界各国

寄给的交换图书1.2万余册,其中95%是俄文图书<sup>[37]</sup>。1950年1月,文化部正式批准北京图书馆开展与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出版物交换工作,截至1950年底,北京图书馆除新增与乌克兰等4个共和国科学院图书馆交换刊物外,还增加了同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6个国家12个单位的交换关系<sup>[36]419</sup>。1954年,北京图书馆已与21个国家和地区的74个单位开展交换工作,另有178个赠送单位,其中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单位,如“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哈佛法学院图书馆及瑞典、丹麦、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少数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sup>[36]419</sup>。

随着国际交换工作的逐步开展,我国一些基础较好的单位也尝试着开展这一工作。1953年2月,南开大学图书馆与苏联基辅图书馆建立书刊交换关系<sup>[38]</sup>。为了有序地开展这一工作,5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各地图书馆切勿自行与外国建立书刊交换关系的通知》<sup>[39]130</sup>,进一步规范了当时国际交换工作的开展。

1955年后,我国扩大了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图书馆的联系,国际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标志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抗美援朝的胜利,迅速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真正做到了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1954年新中国首次以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5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1955年,我国参加了有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政府代表团召开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由于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后盾,有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的出色工作,推动了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通过这两次会议,我国的国际地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空前提高,加强了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1955年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我国在出版物的国际交换方面扩大了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各图书馆系统都明确图书馆应承担起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任务。由此,国际交换工作由与国外扩大文化交流、扩大馆藏,转向有目的地、积极主动地为国内科研单位交换他们需要的书刊,图书馆界提高了开展国际交换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年7月,内蒙古图书馆向北京图书馆交换组发函,希望通过北京图书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列亚特自治共和国建立购置、交换蒙文书刊的关系<sup>[40]</sup>。同时,政府对统一

开展国际交换也开始适度放开。是年9月,中国科学院第25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著作国际交换的几项规定》,在规定的原由院图书馆统一对外交换书刊的办法改为本院各研究机构可与一切国家研究机构进行交换或赠送书刊<sup>[39]145-146</sup>,由此开启了中国科学院国际交换工作的高峰期。翌月10日起,根据新订的规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系统开始把我国的数学、物理、农业、天文等各种学报分别寄赠给印度尼西亚、埃及等10多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机构。至1956年,“该图书馆已经和51个国家的733个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经常收到的世界各地天文学资料就有100多种”<sup>[27]30</sup>。是年,北京图书馆已同欧、亚、非、澳、南北美各洲64个国家563个单位建立联系,交换出版物,并编印“国际交换新到书刊目录”(月刊),向读者介绍新到的交换书刊。至1956年上半年,还代国内78个单位交换到书刊310种<sup>[27]28-29</sup>。

一些国内图书馆也开始展开国际交换工作。1956年,重庆图书馆与罗马尼亚科学院图书馆建立书刊交换关系。在交换过程中,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重庆图书馆“将影印宋版《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一种12册作为礼物交换给他们。到1965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换关系”<sup>[41]</sup>。1957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开始国际交换工作,采用专业对口、数量不等、不以等价、等页或等量书刊作为交换标准。该台所寄出的交换刊物以公开出版刊物为主,亦有内部刊物<sup>[42]</sup>。甘肃省图书馆于1958年5月,根据中央文化部《关于中苏文化合作协定1958年执行计划》决定,与苏联乌兹别克图书馆开展对口图书交换<sup>[28]163</sup>。同时,国内许多馆还建立了国际互借关系。1956年3月,北京图书馆与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开始建立国际互借关系<sup>[21]52</sup>。1959年5月,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与苏联国立斯塔克罗坡里师范学院图书馆建立馆际互借关系。

1960年前后,全国进行整顿书刊报纸出版工作,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数量减少,部分杂志停刊。当时图书馆界在全国公开发行的两份期刊《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工作》亦于1960年第3季度停刊,1961年1月起另出《图书馆》(双月刊)。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矛盾公开,我国图书馆界与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的书刊交换进入低谷,甚至半停顿状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外交方针同步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我国图书馆界国际交换工作的走向。我国开展国际交换的单位都努力调

整交换格局,将交换方向向欧美发达国家转移。在1958年至1965年间,北京图书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交换关系发展很快,“达成协议的单位约占此时全部交换单位的70%~85%”<sup>[34]</sup>,并进一步加强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与交流。“1962年,为了加强文化交流,又在亚、非、拉3洲增加了8个国家和地区的141个单位”<sup>[43]</sup>。至1965年底,北京图书馆共与127个国家的3389个单位建立交换关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文献交换对象“到1960年,发展为六十三个国家的一千四百七十五个机构”<sup>[44]</sup>，“仅以院图书馆为例,现在通过交换的方式共得到期刊6000多种,其中有1000多种就是属于难订的或订不到的”<sup>[45]</sup>。至1964年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已与69个国家的1808个机构建立了书刊交换和赠送关系,1950年至1964年,共收到图书74128册,期刊378159册<sup>[46]</sup>。

## 6 结语

1949—1966年上半年,我国图书馆界在国际人员交流、互相访问参观、出版物的国际交换工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成绩是在我国对外关系的战略和政策的指引下取得的。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界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出版物交换工作经历了两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在外交战略“一边倒”的战略态势下的对外交流阶段和20世纪60年代在“反两霸”的战略态势下的对外交流阶段。

第一阶段的对外交流和出版物交换工作,是在新中国外交战略全面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战略下开展的,因此,我国图书馆界的对外交流和出版物交换工作显示出了以苏联为核心,以东欧和周边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兼顾其他国家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中期,基本上完全贯彻执行了这一战略。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我国外交战线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我国图书馆界亦加强了和第三世界国家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出版物交换工作。

在第二阶段“反两霸”时期,我国图书馆界继续密切加强和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中仍然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国际交换工作,加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和团体单位的文化交流和出版物交换工作,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出版物交换工作,促进文化交流和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435-1436.
- [2] 毛泽东.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470.
- [3]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注释 619.
- [5] 毛泽东. 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M]//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31.
- [6] 于洪君. 中苏建交结盟:新中国第一大外交成果[J]. 老年教育(长者家园) 2019(10):8-9.
- [7] 韩叙. 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和重要决策[C]//裴坚章.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46-62.
- [8] 陈昌本. 毛泽东和中外文化交流[C]//裴坚章.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35-45.
- [9] 教育部. 1950年度派往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交换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M]//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8-69.
- [10] 马叙伦. 关于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M]//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92-94.
- [11] 马叙伦. 马叙伦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方针与工作的报告[M]//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17-221.
- [12]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教育部党组等《关于检讨官僚主义和对今后普通教育方针的报告》等三个报告给各级党委的指示[M]//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39-246.
- [13]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人事部关于1953年选拔留苏预备生的指示[M]//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06-207.
- [14] 刘琳琳. “一名合格的图书馆员”——记赵世良先生[J]. 图书馆建设 2008(1):112-115.
- [15] 苏州图书馆馆史编委会. 苏州图书馆编年纪事:1914-2004[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 [16] 安琪. 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始末——访翻译家师哲[J]. 国际人才交流,1989(1):34-35.
- [17] 郝伟斌. 贺默嫣. 著名档案文献编纂学家——谢列兹曼夫[J]. 档案管理 2007(3):8.
- [18] 刘国钧. 回忆雷达娅专家[J]. 图书馆工作,1958(1):29-31.
- [19] 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苏联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同志关于图书馆工作报告集[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58:出版说明.
- [20] 王荣国. 辽宁省图书馆六十年[M].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8:411.
- [21] 李致忠. 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1909-2009)[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 [22] 王红岩. 20世纪50年代高等院校聘请苏联专家述评[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7(3):39-41.
- [23] 李嘉琳. 山西大学图书馆史[M].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
- [24]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史》编写小组. 风雨甲子铸书魂——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史(1951-2011)[M].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1:4.
- [25] 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纪事(1907-2000)(修订补充稿)[M]. 西安:陕西省图书馆,2001:33.
- [26] 陈自仁.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史[M]. 兰州: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2010.
- [27] 倪晓建. 北京地区图书馆大事记(1949-2006)[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 [28] 甘肃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九十年(1916-2006)[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 [29] 长春图书馆. 长春图书馆大事记(1910.11~1995.12)[M]. 长春:长春图书馆,1996:34.
- [30] 毛泽东. 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6-47.
- [31] 李致忠.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1909-2008)(中)[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 [32]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史[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117.
- [33] 外文出版社[EB/OL]. [2021-11-01]. <https://baike.soc.com/doc/6210535-6423805.html>.
- [34] 段洁滨. 书刊国际交换工作回顾与探索[J]. 图书馆论坛 2002(4):20-23.
- [35] 马静,黄曼丽. 国家图书馆书刊国际交换发展史浅析[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7(2):90-91.
- [36] 李致忠.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1909-2008)(上)[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 [37] 段洁滨. 国家图书馆俄文“中国学”(汉学)书刊的国际交换回顾与展望[J].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09(4):22-25.
- [38] 天津市图书馆志编修委员会. 天津市图书馆志[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365.
- [39] 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 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40] 乌林西拉. 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751.
- [41] 重庆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馆史(1947-2007)[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6.
- [42] 黄璧坤. 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几点体会[J]. 江苏图书馆学报,1986(4):23-25.
- [43] 李致忠.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09.
- [44] 顾家杰. 欢庆建馆十五周年[J]. 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1965(5):2-18.
- [45] 加强采访工作,更好地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J].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60(6):3-9.
- [46]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国际图书交换组. 我们是如何进行国际书刊交换工作的[J]. 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1965(3/4):23-25.

[作者简介]吴徐年,江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顾焯青,江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21-12-06

(刘平 编发)

(下转第69页)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建祥.著名地理学家冯绳武[G]//政协秦安县委学习文史委员会.秦安文史资料选编,1999:74-78.
- [2] 韩春平.民国时期兰大图书馆历任主任考[J].档案,2020(4):35-46.
- [3] 冯绳武.图书馆工作报告:1951-07-14[A].兰州:兰州大学档案馆,档号:兰州大学2-45.0004:8-17.
- [4] 吴宗汾.签呈:1951-10-11[A].兰州:兰州大学档案馆,档号:兰州大学2-45.0007:23.
- [5]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简介[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52.
- [6] 图书馆一九五〇年度工作总结:1951-00-00[A].兰州:兰州大学档案馆,档号:兰州大学2-25.0003:4-5.
- [7] 第十一次校务会议记录:1950-04-25[A].兰州:兰州大学档案馆,档号:兰州大学4-1-32.0006:35.
- [8] 兰州大学图书馆组织与各项暂行规程:1951-02-23[A].兰州:兰州大学档案馆,档号:兰州大学2-45.0005:13-17.
- [9] 关于图书统一购置与集中管理分散使用的意见:1951-08-13[A].兰州:兰州大学档案馆,档号:兰州大学2-45.0007:19-22.
- [作者简介]顾淑彦,兰州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海花,兰州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 [收稿日期]2021-11-05 (肖蔚 编发)

## Feng Shengwu's Contribution to Lanzhou University Library

Gu Shuyan Wang Haihua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Feng Shengwu was a famous scholar who was well known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geography,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him as 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Lanzhou University libra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view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ource construction, resourc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library during his tenure.

**Keywords** Feng Shengwu. Lanzhou University. Library. Contribution.

(上接第65页)

##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ork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Diplomatic Strategy (1949 to 1969)

Wu Tunian Gu Yeqing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adopted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one-sidedness" in the 1950s and "anti-hegemony" in the 1960s.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from 1949 to the first half of 1966, libraries in China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by sending students abroad to study, inviting Soviet experts in library science to guide the libraries' work, inviting foreign experts to visit Chinese libraries, sending domestic experts abroad to visit and participate in relevant activities,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publications.

**Keywords** Diplomat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Library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y of librarianship.